

ZHEXUEQIANYANXILIESHU

天与人

——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

冯禹 著

ZHEXUEQIAN
YANXILIESHU



ZHEXUEQIAN
YANXILIESHU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黎东

冯 禹 著

“天”与“人”——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5 插页4 字数140千
1990年1月第一版 1990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1115-3/B·31

定价：3.10元

编者前言

哲学的发展与历史的实践一样，不能沉溺于显赫的轰动效应，只能依赖敏锐而扎实的工作。这一套系列书，所企图的就是反应著译者在哲学前沿的辛勤耕耘。不论它们是否起眼，却都是作者们多年关注、长期研究的课题，理论性、现实性也是比较强的。在选题和编稿时，我们非常注意如下两个要求：一是面向世界，纵贯古今，力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触及原有哲学理论中的空白或薄弱环节；二是增加可读性，尽量使之不仅对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而且对一般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又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爱思考的读者，都有相当吸引力。当然，不敢说这些书都已达到上述高标准，但作者和编者确实这样努力做了。我们希望因此而对读者有所帮助。

对哲学的追求难免时冷时热，冷时不值得大惊小怪，热时亦切忌期望过高。许多事有赖于共识和协作，收获在锲而不舍之中。重庆出版社慨然提供出版系列书这样一个机会，给了我们可能去把一些同道集合起来，一年让两三本问世。我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历时最久的一对哲学范畴.....	(2)
二、最大众化的哲学问题.....	(4)
三、研究的必要性和现状.....	(9)
第二章 前提——何谓“天”？何谓“人”？	(13)
一、“魔物”.....	(13)
二、“天”与“人”涵义的历史演变.....	(15)
三、个性与共性.....	(26)
四、几个基本问题或基本角度.....	(29)
第三章 天人感应	(32)
一、西周初期的种人感应论.....	(33)
二、西周末至战国时期“自然化” 的天人感应.....	(39)
三、墨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44)
四、韩愈的天人感应.....	(49)
五、理学的天人感应.....	(56)
六、反天人感应理论.....	(62)
七、天人感应与中国的文学艺术.....	(70)
八、天人感应与封建政治.....	(75)

第四章 天命与人力	(80)
一、“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的命定论.....	(81)
(一) 神学的天命决定论.....	(81)
(二) 道家的命定论	(85)
(三) 王充的自然命定论.....	(93)
二、儒家对于天命和人力的调和.....	(97)
三、“天命”与中国的史学理论	(106)
四、反天命决定论	(112)
(一) 墨家的非命说	(113)
(二) 柳宗元、刘禹锡的反命定论.....	(115)
(三) 明代至近代的“造命”说	(117)
五、感应论与命定论的关系及其对大众的影响	(121)
六、历史的评价与现实的分析	(133)
第五章 天道与人道	(141)
一、“法天”论	(141)
二、天道人道相分论	(157)
三、“天道”观念与中国辩证思维的发展	(163)
四、从“法天”看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特点	(169)
第六章 天性与人为	(173)
一、先秦对于天性与人为关系的几种典型看法	(173)

(一) 孟子的“天爵论”	(174)
(二) 庄子的“无以人灭天”论	(176)
(三) 荀子的“积伪俟化”论	(179)
五、在后代占统治地位的天性人为关	
系论	(182)
五、天性人为关系论对于大众的影响	
.....	(186)
(一) 人性的先天性	(187)
(二) “天理(天地)良心”观	(189)
第七章 天理与人欲	(192)
一、程朱学派的存天理、灭人欲说	(192)
二、“理存于欲”说	(197)
三、李贽的人心即私心论	(201)
四、近代哲学对于“存天理、灭人欲”	
的批判	(204)
五、天理人欲之辨的影响	(206)
第八章 天人孰胜	(211)
一、天胜人说	(211)
二、天人交相胜说	(217)
三、人胜天说	(221)
四、对于“人定胜天”的几点思考	(223)
第九章 结论	(226)
一、“天人合一说”就疑	(227)
(一) “天人合一”的确切涵义	(228)
(二) “合一”还是“一两”	(229)

(三) 中西比较	(239)
二、从天人关系论看中国传统哲学的	
特点	(244)
(一) 朴素辩证法与推理的不严格性	(245)
(二) 尊重传统与概念的模糊性	(247)
(三) 中国哲学对于宗教的扬弃的形式	(250)
(四) 对于人的能动作用的重视和对于这 种作用的方向性的严格规定	(253)
三、上述特点形成的原因	(257)
结束语	(261)

第一章 绪论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要建设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迎接未来的挑战，就不能不批判地继承我们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悠久的文化遗产，亦即我们的传统文化。

但是，什么是传统文化呢？近年来，思想界和文艺界对于传统文化问题和“寻根”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4000年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而在这种多元的传统文化之中，传统哲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它要比诸如京剧等具体的文化艺术形式历史久远得多，它也比用土石筑成的万里长城更为牢固和稳定。因为，它扎根于中国民众的心理结构之中，所以绵延不绝，久盛不衰。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们——无论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还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都不能不受这种传统哲学的影响和制约，用与其

有关的思维方式去进行他们的创造活动。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之中，天人关系问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方面。要想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要想批判地继承这一文化，不能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论作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总结。

一、历时最久的一对哲学范畴

中国哲学、古印度哲学、古希腊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涌现出大量的范畴和概念，这些范畴和概念大多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但是，人类认识发展又具有共同规律，作为人类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带，范畴和概念大多是成对的，哲学家们总是通过揭示这些对立范畴或概念的关系来展开其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也不例外，如“阴”与“阳”、“道”与“器”、“知”与“行”、“理”与“势”等著名范畴，都呈现出成对性。那么，在中国哲学家所提出的大量的“对子”中，哪一个是最古老的呢？许多人可能回答说，是“阴”与“阳”，其实不然，最古老的范畴当推“天”与“人”，这对范畴的提出，不晚于西周初期。尽管“阴阳”、“道物”等对范畴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在西周初期，却都尚未出现。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有一些哲学范畴虽为少

数哲学家所提倡而一时风行，但不久就消声匿迹，或者仅是“化石般”地存在于古代文献之中，例如古希腊斯多葛派的“普纽玛”(pneuma)和中国后期墨家所提出的一系列逻辑范畴(“侔”等等)。“天”与“人”这对哲学范畴决不是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自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生活于公元前11世纪)，直至近代的章太炎(1869—1936)，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都把“天”与“人”作为自己体系中的主要范畴之一。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天人关系问题可以说是当时哲学争论的最重大的问题，是老聃(公元前6世纪)、孔丘(前551—前479)、墨翟(公元前5世纪)、庄周(公元前4世纪)、孟轲(约前372—前289)、荀况(约前313—前238)、董仲舒(前179—前104)、王充(27—约97)等第一流哲学家所探讨的中心。魏晋时期，天人之辨虽然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有郭象(?—312)等哲学家对此作了认真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隋唐时期，则有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刘禹锡(772—842)之间展开的有关天人问题的激烈争论，甚至佛教哲学家宗密(780—841)也参加了争论。宋明时期，天人关系重新成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之一，被邵雍(1011—1077)、张载(1020—1077)、朱熹(1130—1200)、王廷相(1474—1544)、王夫之(1619—1692)等哲学名家所津津乐道。在近代史上，无论

是地主阶级开明派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1814—1864)、洪仁玕(1822—1864)、资产阶级改良派严复(1853—1921)、康有为(1858—1927)、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孙中山(1866—1925)，无不新的社会形势下对天人关系这一传统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既使在现代生活中，“天”与“人”这对范畴仍然在一定场合下为人们所使用，并没有完全成为一种历史的遗迹。

总之，“天”与“人”这对范畴已经延续了30多个世纪，有关天人关系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并且看来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历史如此久远，生命力又如此顽强的哲学范畴，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即使就世界范围而论，恐怕也很少有能与之匹敌者。

二、最大众化的哲学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曾讨论过为数众多的哲学问题，但是，对其中有些艰深晦涩的问题的探讨仅限于个别思想家的小圈子之内，虽有少数哲人津津乐道，探迹索隐，争论不休，却并不能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和大众的关切，因而可称阳春白雪，和者必寡。例如，先秦名家的坚白、指物问题，魏晋隋唐佛教的般若、涅槃问题等，不能

说不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和理论深度，但是，其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因而，在普通老百姓看来，“白马非马”之类的名家命题，纯属诡辩，甚至可以作为诡辩的代名词；佛教理论对于中国民众影响很深，但这主要是“因果报应”、“轮回”之类，而不可能是玄而又玄的“般若”、“涅槃”。然而，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天”与“人”关系的探讨，却与上述晦涩的哲学问题迥然相异。一方面，它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为历代哲学家所高度重视，各抒己见，争辩不休，错综复杂，至今不绝；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超过其它任何哲学问题的普及性，对于中国民众的观念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下层民众可能没有听说过“坚白”、“玄冥”（魏晋玄学的重要哲学概念）、“般若”，更不太可能去思考这些高耸入云、远离日常生活的抽象理论，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不知道“老天爷”，不能不思考他们的生计与“天”的关系。

关于天人关系的哲学探讨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宗教、历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以及民俗等等。试举几例：

（1）宗教方面。北京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代建筑——天坛，这曾是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举行祭天典礼的地方，据记载，两代帝王在这里举行的祭天仪式多达数百次，几乎是年年不漏，平

日作威作福的皇帝逢祭天之时变得毕恭毕敬，十分虔诚。“天”3000年来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尊奉的最高神，他们认为“天”的神灵胜过其他神灵，可以主宰一切，他们希望通过祭天来求得天的保佑。

(2) 历史学方面。可以举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不朽历史名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西汉人)为例。他曾把“究天人之际”(意为彻底搞清楚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因为，在历史现象中，有很多东西似乎不能用人的意志或行为来解释，而是决定于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这种东西，常被归之于“天命”。不搞清人的意志与“天命”的关系，历史学家便不能成功地解释历史进程。在《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本人对于天人关系的苦心探究。

(3) 文学艺术方面。可以举元代著名戏曲艺术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和元末明初小说界巨擘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例，二者均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名作，它们不仅受到有关天人关系的哲学理论的明显影响，而且甚至直接对天人关系作了哲理性的探讨。《窦娥冤》的结局是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引起天怒，六月降雪，这是一种典型的天人感应思想，同时在该剧中，作者也表露出对于“天”的主宰作用的怀疑，如主人公窦娥在

临刑前唱道：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不能不说是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论探讨，作者通过对于天地的批评实际上抒发了对于社会不平的愤慨。《三国演义》一书则充斥着天人感应、天命决定等理论。在其它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比比皆是。除了佛教的报应、轮回，道教的神仙术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和宗教理论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能与天人关系理论的影响相提并论。

(4) 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古代比较发达的自然科学学科是农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等。其中，天文学直接是研究“天”，并且总是多多少少地把天象同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相联系；中国古代的数学与天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周髀算经》既是天文学名作，又是数学名作，因而也不免涉及天人关系问题；中国农学离不开对于“天时”与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关系的探索。这些，都是显而易见，无需多论。而中国的传统医学理论，也同关于天人关系的哲学探讨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

影响，例如，人的健康状况被认为受到“天”的变化的直接影响，等等。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名著之一《黄帝内经》的许多章节，既可以看作是深刻的医学理论，同时又是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探讨。例如，《阴阳应象大论》说：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

这里，把天地生成，宇宙结构，气象变化同人的心理和生理功能融为一炉。类似的论述，在《黄帝内经》中俯拾皆是。

（5）民俗方面。我们可以举婚礼为例，直至近世，“拜天地”还是婚礼中最基本的仪式之一。

从以上诸例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天人关系论这一历史悠久的哲学探讨有关，“天”与“人”的关系问题具有深入而又广泛的影响。

甚至，我们今天对于自然和人生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历史上的天人关系论的影响，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有不

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怨天尤人”、“天无绝人之路”、“天时、地利、人和”、“天理(地)良心”等仍然极为流行的格言俚语，就不难看到这种影响。在街头巷尾，仍然可以听到有些人在连遭挫折后发出“人的命，天注定”之类的感叹。

上述现象，不仅进一步提示了天人关系论的普及性和大众性，而且也提示出其现实性。

三、研究的必要性和现状

由于中国历史上关于天人关系的探讨长达30余个世纪，由于这一探讨影响、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天人关系论无疑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思维特色的问题之一。进一步讲，这一探讨不仅存在于已经流逝的历史长河中，而且也影响到现实，今天它仍然在某些方面发挥着作用。可见，对于历史上的天人关系论及其现实影响，实在是值得深入、全面地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将有助于揭示中国哲学的特点，清算历史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自从郭沫若先生在本世纪30年代撰写《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以来，现代学者已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论做了不少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

但也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和提高。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对于历史上个别思想家的天人关系论的研究，例如对于荀况的“明于天人之分”的理论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是，系统的、总体的、宏观性的研究尚嫌不足。台湾学者杨慧杰先生写了一本题为《天人关系论》的著作，但实际上只是主要介绍先秦哲学家的天人论，汉代以后的发展只是一带而过，因而并未能超出郭沫若先生的研究范围。可以说，迄今尚无一本真正能够通论中国历史上天人关系学说的专著。而如果不把个别思想家的天人论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发展进程中去加以考察，是不可能对于该思想家的理论加以准确、全面的评价的。事实上，这一领域中的微观研究的发展正是受阻于宏观研究的缺乏，整体眼光的不足使得对于个别人物的研究难以深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些研究把天人关系论仅仅简单地限于“自然观”或者“宇宙论”(cosmology)的领域。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论所涉及的哲学问题极为广泛，它包括自然观或宇宙论的问题，但决不是仅此而已，至少还包括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从上述那种简单化的看法出发，显然无法全面地描述3000年来天人关系论的演进，无法科学地总结这一宝贵遗产。简单化的另外一种表现是把历